

HEI LONG JIANG
YAN AN DE BULUO

黑龙江沿岸的部落

E·И·杰烈维扬科/著
林 树 山/姚 凤/译



吉林文史出版社

11.511/43

1957108



黑龙江沿岸的部落

Е · И · 杰烈维杨科 / 著
林树山 / 姚 凤 / 译
林 沅 / 校

RD3/101

中 译 本 序 言

靺鞨是我国东北地区的古代民族之一，是渤海人和女真人的直接先世，是肃慎和挹娄的直系后裔。早在公元一千纪前半期，靺鞨人同我国东北各族人民一道创造了具有北方风格的灿烂文化，并于公元七世纪建立了我国唐代东北的地方政权之——渤海国（公元698～926年）。

人所共知，靺鞨人同我国国内其他古代民族（尤其是汉族）的各种联系，靺鞨人的历史文化是我国古代各族历史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十八世纪以来，沙皇俄国用极不光采的手段，强迫清朝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的条约，攫取了大片大片的中国领土。从而在现今苏联远东地区留下了众多的中国古代少数民族的文化遗存。靺鞨人是生活在这一地区的中国古代民族之一，弄清这一古代民族历史文化的来龙去脉，对于我国东北古代、特别是渤海史和女真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这也是我国史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苏联对靺鞨文化遗存的专门考察始于三十年代，而在此之前（包括俄国人）的一些考察与研究一般都是非专业性的，往往带有顺便和即兴的性质。即便如此，他们的某些考察成果亦含有若干不容忽视的内容。

六十年代初，苏联学术界加强了对靺鞨文化遗存的考察与研究，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主要学者是苏联科学院西伯利亚

总分院历史语文与哲学研究所一级研究员、A·П·奥克拉德尼科夫院士(1908~1981年)的得意门生、考古学家E·И·杰列维扬科。六十年代以来,她一直在黑龙江流域从事考古调查,并先后发表了一系列与靺鞨历史文化有关的学术论著。其中主要有:《论阿穆尔河中游靺鞨文化遗存的研究》(1968年),《阿穆尔河沿岸的靺鞨遗存》(1969年),《扎维塔亚河畔的靺鞨古城址》(1969年),《米海洛夫卡村附近靺鞨古城址的发掘》(1969年),《靺鞨人饰件腰带上的突厥艺术成份》(1973年),《关于靺鞨部落的葬俗》(1974年),《关于公元一千纪后半期远东部落同中央亚细亚游牧部落的古代联系问题》(1974年),《特罗伊茨基墓地》(1977年),《阿穆尔河中游的靺鞨遗存》(1975年)《阿穆尔河中游的中世纪遗存》(1980年)等等。

在这些著作的基础上,杰列维扬科又参考国内外的有关学术成果和我国史料,于1981年撰写了这部关于靺鞨部落的综合性专著《黑龙江沿岸的部落》(诺沃西比尔斯克版)。可见这是作者自研究靺鞨以来的一部代表作。全书(指原文)331页,前置绪论,后有结语,插图47幅,书后附有参考文献目录索引。书中正文七章,分别论述了国内外的有关学术成果:靺鞨经济(农业、畜牧业、狩猎业、捕鱼业和其它生业、金属加工、陶器生产、木器与骨器的制作、贸易与交换等)、住宅(含日常风习与祭日)、军事、社会制度与毗邻关系、精神文化、民族起源等内容。

不可否认,杰列维扬科的这本著作对了解这一地区的历史文化有一定意义,她披露的有关考古资料对我国历史研究工作者有重要参考价值。这也是我们翻译此书的主要原因所在。

必须指出,杰氏在此书中宣扬的许多观点是我们不能接

受并坚决反对的。出于某种政治需要，杰氏矢口否认沙皇俄国利用不平等条约强占中国大片领土的历史事实，否认黑龙江沿岸地区在历史上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故意把我国古代北方民族同中原民族对立起来，把北方民族地方政权的建立说成是“争取独立”，“渤海国制止了侵略企图”，并把我国唐代渤海这一地方政权说成是“通古斯人的国家”，拒不承认我国早在一千多年前就已有效地管辖着黑龙江下游和滨海地区的历史。

为了迎合上述观点，杰氏还千方百计抹杀北方民族和中原民族一直存在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不可分割的联系。不但在行文中把中国的各民族严格对立起来，而且在绪论中她说：四世纪以后“中国人的意识形态和文化亦未能逾越万里长城”，还说：远东古代民族“从来不曾有过汉人的儒家思想”，并自欺欺人地说：“在发掘女真古城时发现的一些东西“并不能说明中国文化的渗透，而只能说明女真人从中国运走了大批的战争卤获物”。

为了否定中原文化与当地文化的密切联系，杰氏还片面夸大当地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她说“在远东的地下蕴藏着阿穆尔河沿岸部落的高度物质文化，他们独特的艺术，有不同于中国、日本的思想体系的世界观，有发达的社会制度”等等。

还应该指出，杰列维扬科本人并不能直接引译中文史料，只能转引俄苏其他学者的现成译著，因此援引了不少别人已经误译了的东西。本书译者本着“避轻就重”的原则（即在不响作者意图的情况下，尽量复原我国史料的本来面目），一般未加译注，非加不可时，也只是做了扼要的说明。

译者

1985年12月10日

• 3 •

目 录

绪论	(1)
文献与史料	(9)
阿穆尔河沿岸部落的经济	(33)
农业	(40)
养畜业	(51)
狩猎业	(54)
渔业和其它生业	(56)
金属加工	(60)
陶器生产	(70)
木器与骨器的制作	(76)
贸易与交换	(81)
住房	(95)
关于某些日常仪式与祭日	(134)
军事	(165)
社会制度与毗邻关系	(210)
精神文化	(229)
艺术	(230)
宗教 · 崇拜 · 风俗	(255)
民族起源的某些观点	(327)
结语	(379)

绪 论

公元一千纪后半期，在远东南部发生了一些重大的社会政治变动，这同原始公社关系的进一步解体和一些部落的组合是分不开的。这些部落分别分布在阿穆尔河流域、滨海边区、朝鲜部分地区和满洲。中国历代朝廷多半都把注意力放在朝鲜和其他“住有夷狄的北土”上。抵御中国朝廷的侵略乃是这些部落联合起来的原因之一。

靺鞨部落正处在这些事变的核心。强大的部落联盟凡有七部：粟末、伯咄、安车骨、拂涅、号室、黑水、白山等。

七世纪末，在远东（本书这里及以下皆指苏联远东）南部地区和朝鲜东北部建立了渤海国。通古斯满族的一支——靺鞨诸部落，构成了这一国家的民族核心。

直至不久以前，有关靺鞨部落的资料还只能从古代中国、朝鲜和日本部分文献史料中去索取。靺鞨一称首见于（公元四世纪的）《魏书》。然而，这些史书对一些民族共同体及其相互关系的阐述并不那么连贯。所以，至今人们也不清楚，例如匈奴或者鲜卑是怎样兴起的，如何征服了大片领土等等。要回答这些问题，仅仅依靠文献资料是不可能的。只是随着北亚和东亚大规模考古发掘的开始，才积累了有关这一地区一些部落与民族历史的大量实物资料，发现了一些遗

存，后来又发现了一系列彼此更迭的考古文化，因此才显现出一幅比较完整的数千年历史发展的图景。А·П·奥克拉德尼科夫对远东的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从一九三五年起就在这一地区进行发掘，把一些零散的实物资料综合成完整的体系。他还发现并首批发掘了一些靺鞨的文化遗存〔1〕。А·П·奥克拉德尼科夫所开创的这一事业已为Э·В·沙弗库诺夫、本专著作者和其他一些研究人员所继承。在滨海边区和阿穆尔河流域的辽阔大地上，还划分出一些在陶器、劳动工具和兵器等方面显然都同靺鞨遗存相近、在类型上同靺鞨遗存相似的遗存。

在许多有关阿穆尔河中游公元一千纪后半期重要遗存的著作中，我们着重研究了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2〕。这基本上是一些已经发表了的、不作广泛历史评述的考古资料。实物资料的积累，使我们有可能进一步深入研究现有的史料，目的是为了超脱考古文化本身的框框，进而提高研究（重新撰写民族史）的水平。多年来的田野考察、有关民族学资料的探索、文献史料、人类学资料、语言学资料和其他学科资料的研究，为此提供了条件。

民族特征，即某一民族共同体的一些特点，可以把民族共同体从其他所有共同体（语言共同体、文化生活方式共同体、民族自我意识共同体等）中区分出来。Н·Н·切鲍克萨罗夫写道：“可能存在居住于同一地区、拥有共同经济基础并操同一种语言的一些民族，但是没有甚至也不可能有文化上完全一致的两个民族”〔3〕。

如众所知，劳动过程中创造出来的物质内容，在文化上可以区分出它的精神方面（知识、信仰等）和行为方面（劳动方式、习惯、风俗等）〔4〕。所有这些特征构成了一个不可

分割的整体，并为各门学科所研究：考古学、民族学、人类学、语言学等等。这些学科通过相互补充则可以复原出早已消逝了的那些民族的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从而确定出每一种文化的一般性规律和局部性规律。

马克思说：“要研究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之间的联系，首先必须把这种物质生产本身不是当作一般范畴来考察，而是从一定的历史的形式来考察……如果物质生产本身不从它的特殊的历史的形式来看，那就不可能理解与其相适应的精神生产的特征以及这两种生产的相互作用”〔5〕。

每一个民族共同体都有自己经济形式、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方面的一些特点，并由此产生了劳动工具、住宅、服装形制上的一些特点、风俗特点、遗存特点等等。这些民族特征的世代留存，乃是民族传统的效验，也是民族自我意识的体现。

因为公元一千纪阿穆尔河沿岸部落分别与中国、朝鲜、突厥和蒙古诸民族为邻，所以在研究过程中不能不援引这些地区的一些考古学资料和民族学资料。另外，也不能回避那些远离鞑靼边界（在中央亚细亚草原）所发生的一些事件，这些事件在阿穆尔河沿岸部落的民族史中也曾引起了一些变动。

一至八世纪期间，在中央亚细亚草原形成了一系列游牧民族共同体：匈奴、丁零、东胡、乌孙等等。公元九三年，匈奴为鲜卑所灭，因而分成四支：一支随变为鲜卑人，另一支定居在七河流域，第三支迁往欧洲，第四支徙入中国。匈奴人徙往中国途中，不可能不对阿穆尔河沿岸部落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所以在后者的文化中存在一些起源于匈奴的文化成份。

从二世纪起，出现了大规模的人口迁动，开始了远距离

的迁徙。一部分匈奴人、鲜卑人、狄人、羌人和其他一些古代中国人的毗邻民族逐渐占居了中国的中部平原〔6〕。从四世纪起，一些坚持摆脱中国争取独立的民族，统治了中国以北的领土，中国历代史书都把这些民族称之为“野蛮人”。然而，就是在这些“野蛮人”联盟的衰败时期，中国人的意识形态和文化也未能逾越万里长城。个别发现的，例如在发掘女真古城时发现的一些东西，并不能说明中国文化的渗透，而只能说明女真人从中国运来了大批的战争卤获物。正像中国人从北方民族那里效仿了许多东西一样，远东民族也吸收了中国物质文化的某些成份，但后者从来不曾有过汉人的儒家思想。阿穆尔河沿岸部落在其多世纪的发展期间创造了自己具有古代传统和根深蒂固的文化。一些考古调查表明，在远东的地下蕴藏着阿穆尔河沿岸部落的高度物质文化。他们有独特的艺术，有不同于中国、日本思想体系的宇宙观，有发达的社会制度。这些部落的社会制度以通古斯人国家渤海的建立而告结束，渤海国制止了中国的侵略企图。

公元一千纪乃是一个复杂的历史时期，充满了重大而明显的事件。许多民族的迁徙导致了一些新的民族共同体的建立，其中许多民族共同体并不那么稳固，并作为独立的民族个体而消逝了。这也是自然的。如众所知，两三个以上的民族共同体结合在一个早期国家中，多半会导致这个国家的没落与崩溃。突厥汗国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颇为强大的突厥人也无法长期把一些被征服民族控制在自己的政权之下，正像此前占领了中国整个北方的四万匈奴人那样，同样不能长期控制其所占领的土地。一部分中国人迁到了南方，同蛮人部落融合在一起，形成了南中国民族共同体；另一部分中国人则陆续吞并了一些匈奴人，并把他们融合在自身之

中〔7〕。

有时，从一个民族共同体中还会分化出一些群体，并时常改变自己的居地。他们同宗主国逐渐失掉了联系，而同一些土著居民融合到一起，并且由于同原有民族基质的相互同化而形成了一些新的独立的民族共同体〔8〕。在另一种情况下，一些民族共同体在不断迁徙的过程中仍然保留了自己的一些有别于当地民族共同体的特征。无论是哪一种过程，对先阶级时代和早期阶级时代来说都是特别有代表性的。这一时期，由于居民的频繁徙动和急剧组合而导致了許多新的民族共同体的形成〔9〕。

专家们一般都把民族的接触方式分为：（1）共处；（2）同化、杂居、融合。为了进一步研究阿穆尔河沿岸部落民族化过程的方式，让我们先来分析一下公元一千纪阿穆尔河流域民族史中的某些基本问题：经济问题、社会问题、政治问题，最后是民族本身的问题。

正如上面已经说过的那样，作为目前研究依据的一些考古遗存，从A. П. 奥克拉德尼科夫的一些著作问世之时起，就习惯地同靺鞨一名联系在一起。之所以这样做的根据是大量居址、古城和墓地在许多指示成份方面的一致性。这就可以把它们归列为一种统一的文化（当然也有一些区域性的变体）。这种文化涉及到广阔的地理疆域，延续了好长一段历史时期（若干世纪）。同时，靺鞨部落的许多最重要的物质文化成份和精神文化成份，都可以同有关它们的一些文献史料交融为一体。史书中记载的靺鞨部落的分布疆域，同A. П. 奥克拉德尼科夫所提出的靺鞨遗存分布状况并不完全相符。尽管对这一问题的争论尚未最后完结，即使将来也需要一些能够足以证明这一观点的新资料；但是，就目前对

这一问题的研究状况，也可以在这方面进行一些适当的探索。

收集到的资料和文献资料，都是从题目安排的角度而加以阐述的。根据考古学资料、人类学资料、历史学资料、民族学资料，再加上比较历史学的方法，则可以更加准确地弄清那些加入未来通古斯部族的靺鞨民族成份。

民族史不能复原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但为了复原民族史却需要进行多方面的研究：自然环境、社会经济的发展、文化的发展以及文化上的接触等等。比较历史学方法、历史类型学方法，在这方面可以提供许多东西。

历史类型研究同形式比较研究的区别在于：前者规定，在论述研究对象时，不仅要看它们时间上的共存或连续性，不仅要看它们起源、承袭与从简单向复杂演变的单线关系，而且要看反映社会经济发展根本不同阶段的各种历史水平。通过这种研究，不论各社会组织存在顺序的先后如何，都可以确定它们历史类型的异同（即使在表面上彼此相似）〔10〕。

不采用民族学对比的办法，上述问题也是无法解决的，尤其是，留下考古遗存的诸古代部落，从起源上看和从历史上看都与现代阿穆尔河沿岸土著民族是联系在一起的。只有采用这种民族学对比以及同毗邻地区对比的办法，才能比较容易划分出那些从其他民族共同体吸收来的文化成份。同一般对比一样，民族学对比也应建筑在尽可能多尽可能重要的一些特征和属性上面〔11〕。所以，我们还得遵循一定的空间和时间坐标。尽管在许多情况下我们不得不离开研究的主题，但这样做只能是为了解决中心议题的需要。

当然，并不是所有与主题有关的问题都能在本专著中得到解决。然而，本书作者希望本专著能够通过概括所积累的

一些资料而再前进一步。

作者谨向苏联科学院民族学研究所原始社会史研究室、苏联科学院西伯利亚总分院历史语文与哲学研究所考古学与民族学研究室的研究人员，并向本书的一些非正式评论员B·П·阿列克谢耶夫、A·И·佩尔希茨、B·A·什尼列尔曼(民族学研究所)、С·В·格林斯基、A·И·马津(历史研究所)等人的帮助和建议表示谢意。作者特向自己的导师A·П·奥克拉德尼科夫院士表示感激之情。

注 释

- [1] A·П·奥克拉德尼科夫：《滨海边区的遥远过去》，符拉迪沃斯托克，1959年；A·П·奥克拉德尼科夫、A·П·杰列维扬科：《滨海边区与阿穆尔河沿岸地区的遥远过去》，符拉迪沃斯托克，1973年。
- [2] E·И·杰列维扬科：《阿穆尔河中游的鞑靼遗存》，诺沃西比尔斯克，1975年；《特罗伊茨基墓地》，诺沃西比尔斯克，1977年。
- [3] H·H·切鲍克萨罗夫：《苏联学术著作中的族系分类问题》，载《苏联民族学》，1967年，第4期，99页。
- [4] Ю·B·勃罗姆列伊：《族系与民族学》，莫斯科，1973年，10～46页。
-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26卷，第1册，279页。
- [6] M·B·克柳科夫、B·B·马利亚文、M·B·萨弗罗诺夫：《临近中世纪时的中国民族共同体》，莫斯科，1979年，3页。

- [7] Л. Н. 古米列夫:《中国的匈奴人》,莫斯科,1974年,46~51页。
- [8] Р. Ф. 伊特斯:《民族学概论》,列宁格勒,1974年,43~46页。
- [9] 同[4], 156~157页。
- [10] Э. С. 马尔卡梁:《论历史比较研究的基本原则》,载《历史问题》,1966年,第7期,22~23页; А. И. 佩尔希茨:《论比较历史综合法问题》,载《亚非民族》,1980年,第4期,70~82页。
- [11] А. И. 佩尔希茨:《民族学是原始历史复原的一种史料》,载《民族学是复原原始社会史的一种史料》,莫斯科,1979年,34页。

文 献 与 史 料

苏联远东南部部落与民族的历史，早就引起了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东方学家和其他一些专家的注意。他们根据围绕这一问题所积累的实物资料和学术文献，曾经做过某些历史学和书志学分析的尝试〔1〕。

A·П·奥克拉德尼科夫和A·П·杰列维扬科的一些汇集，应当被看作是远东考古遗存调查史方面和文献概述方面的第一批大部头综合性著作〔2〕。在许多有关某一时期远东民族史的研究成果中，也都深入地阐述了历史编纂学问题〔3〕。

本书作者曾经分析过有关公元一千纪阿穆尔河沿岸地区和滨海边区部落史的一些主要文献〔4〕。在这里我想探讨一下近年发表的和以往研究未曾涉及过的一些著作。在这部专著中，十分广泛地使用了考古学资料、人类学资料、民族学资料、文献资料，其中包括档案资料。本书的基础乃是考古学资料。在A·П·奥克拉德尼科夫的领导下，苏联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历史语文与哲学研究所北亚（原远东）考古勘察队积累了大量的有关阿穆尔河沿岸部落古代史的实物资料。例如，已经断定，早在石器时代，这一地区的一些部落就已经转向了生产性经济；而于公元前二千纪末～一千纪

初，它们就有了铁器。如众所知，公元前后，在远东南部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民族共同体，它对毗邻地区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十分重大的影响；而在乌苏里江、结雅河、阿穆尔河、松花江等远东河流的一些谷地，形成了庞大的通古斯满洲民族层。

目前，通过对一些古城、居址和墓地的发掘，收集了一些有关公元一千纪阿穆尔河中游流域部落史的十分广泛的考古学资料。这些资料足以使我们全面深入地阐述陶器、劳动工具、兵器和艺术制品的特征，进而得出具有充分依据的历史结论和概括。公元一千纪部落史中的许多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问题，在我的一些著作中曾经不只一次地阐述过。所以，本书想着重分析一下民族与民族学问题。作者不想对劳动工具和兵器等进行详细的类型学论述，因为在一些发表的专著中已经作过这种分析。在编写经济与军事等章节时，我采用了这些著作中的一些结论。因此，考古学资料使用得很概括，并插入了一些部落的某些民族史侧面。

有关公元一千纪阿穆尔河沿岸部落的一些人类学资料，不久以前才被我们掌握。奈费尔德墓地、科奇科瓦特卡墓地、诺沃彼得罗夫卡墓地的骨骼资料，由于墓葬的掩埋条件和地层条件的特殊性，基本上没有保存下来〔5〕。作者在发掘阿穆尔省特罗伊茨基墓地时，首次获得了大批的头骨。通过发掘，一共发现了60件头骨和少量的其它人类学资料。这些资料曾为B·И·阿列克谢耶夫详细地研究过，其结果已经在—部综合性著作中发表了〔6〕。在这部著作中，记载了远东地区第一套古代的人类学资料。通过与东亚、北亚资料的对比，B·И·阿列克谢耶夫分析了这套资料的形态学特点，揭示了靺鞨人头骨同阿穆尔河沿岸通古斯满人头骨在外形上的

十分相似性，这就证实了以分析靺鞨遗存出土器物为依据所得出的一些史学研究成果〔7〕。

对这些资料的重要意义是难以估计过份的。由于地层条件的特殊性，诸墓地的骨骼资料几乎均未保存下来。据了解，后贝加尔地区的个别人类学发现也属于这种情况〔8〕。所以，这套人类学资料的发现，不仅对人类学家，而且对考古学家、民族学家，特别是对民族起源的研究都具有重大的意义，因为在这一地区交织着通古斯满人、突厥人、中国人、朝鲜人部落的历史命运。B·П·阿列克谢耶夫所得出的这些人类学研究成果证实，这套头骨资料“同样属于统一的蒙古人种综合体”〔9〕。靺鞨人的头骨资料同现代远东及其周围地区的头骨学资料的对比，为B·П·阿列克谢耶夫提供了下述结论的依据：靺鞨人的头骨与东亚及远东蒙古人种（朝鲜人、北方中国人、日本人）的不同之处表现在许多重要的特征上，即颅底至颅顶的高度、颧骨的宽度、面骨高度与宽度的比例、眼框骨的相对高度、鼻骨的宽度、（与眼框最高点和鼻根处于同一水平位置的）上部面骨的扁平程度等等。因此，从这些特征上看，靺鞨人则接近于西伯利亚蒙古人种的中央亚细亚群体和贝加尔群体。另一项特别重要的结论是，靺鞨人的头骨相对地更接近于乌耳奇人和那乃人的头骨类型。在阿穆尔河沿岸及其毗邻地区土著民族的头骨学方面，存有大量的人类学文献〔10〕。

远东民族的人类学研究同考古学研究相结合，则可以阐明远东民族史中的一些极其重要的问题。然而不引用民族学资料要想解决远东民族史上的一些问题也是不可能的。民族学可以从社会文化上对一些考古遗存进行力所能及的阐释。民族学可以把现代一些经济发展落后的前文字社会整个作为